

## 忧患意识的渊源与特点

### 一、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忧患一词产生于战国中期，忧患意识的发展也在这段时期。当然，忧患意识的产生时间可能还要早些，大概在殷末周初。《尚书》这本最古老的历史文献中，《周书》部分就散发出浓郁的忧虑情绪<sup>①</sup>。台湾知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把忧患意识界定为人类在新旧社会更替时期所具有的“一种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sup>②</sup>。他认为华夏民族最初的忧患感发端于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这两个看法基本一致。

究竟什么是忧患意识？

笔者认为，它是奋进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综合体现。忧患表明了主体的觉醒，以其细致的观察和深邃的思索，忧国、忧民，思想活跃，精神激亢，充分表达了一种奋进精神。忧患表明了对社会与环境种种痼疾之忧虑，持有理性的怀疑眼光，以其应有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对痼疾予以否定与批判，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与否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定的目的在于创新，批判则是一种创造意识的萌动。破为了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它又

上述观点转引自夏乃儒：《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

参见台湾《孔孟月刊》，1984年第3卷第2期。

蕴含着强劲的创新精神。忧患意识便是这三种精神的综合，是这三种精神融为一体的表现。

因此 忧患意识的主体 大多是一批博学多才、阅历深广、通古达今的睿智学者。他们从宇宙到人生，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审慎的思索，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当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付诸实践时，却又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于是忧国、忧民、忧世、忧人生的情感越发深沉，成为他们血液中的一种活力，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也是一种自我优化、自我超越的思想升华。

忧患意识的价值实现离不开社会实践环节。一般的说，忧患意识者的忧患，决不是由自我走向自我，而是由自我走向社会。所以，忧患意识又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忧患意识在战国中期得到发展不是偶然的。

战国时期（更广泛地说是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也相当活跃，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商业城市，成为各诸侯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诸侯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地主经济日益强大，逐渐取代了奴隶主贵族经济，社会阶级力量发生分化和新的组合，各国还相继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就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繁荣。

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推动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士”这一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膨胀。随着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没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阶级的分化，取得食禄的“士”阶层中有不少人下降到平民地位，文化知识逐渐渗透到社会的不同层面，而且面对各种势力的激烈竞争，各诸侯国统治者不得不“礼贤下士”，收养和聚拢了一批“游说之士”。如在齐国都城的“稷下学宫”就聚集了千数百人。

“士”阶层的膨胀又引来了学派之争，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当时，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的发展，贤能之士竞相发表自己的见解，力图以自己的见解寻求“治国、安民、平天下”的良策，并以此取悦各诸侯国的统治者。这时“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蠡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sup>①</sup>。于是在他们中间出现了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个最主要的学派，后又出现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史称“九流”。学派不同，见解不同，各抒己见，就引起了纷争。当时还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强大的政治轴心以吸引和控制思想界，思想界的自由度比较高。终于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百花齐放”、“异说竞起”、“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各家学派自由竞争，相互吸收以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繁荣时代。

各派人士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变幻无常的人生世态，使他们的主张和见解，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否定和创新，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忧患意识就在他们的论述和主张中喷涌而出。这批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思考、争鸣、交锋，使得忧患意识喷之愈涌，泄之愈烈，成为那个时代一股强劲的心潮。

当时，最大、最有影响的学派，首推儒家。其主要代表是孔子（孔丘）和孟子（孟轲）。他们的忧患意识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孔丘到孟轲都提倡“忧道”。孔子为了行道救世，怀着宏大的志向和抱负，周游列国陈述政见，抨击时弊，规劝诸侯；“思以其道易天下”，反映出他们弘道救民的忧患意识，以及为这种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为此，他们还主张不断反躬自省，注重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弘道”、“卫

<sup>①</sup> 《汉书·艺文志》。

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发展到孟轲，他身逢战乱不堪，民不聊生，各诸侯国纷求才俊之士的时代。依孟子的口才，他完全可以像张仪那样 身佩六国相印 利用时局 以求宦达 然而他以宏道为己任，依然周游列国，以求道行。并主张与民同忧同乐，提出：“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sup>①</sup> 这虽然是对统治者的劝说，但强调君主与民同忧同乐，毕竟含有较高的民主性的精华。

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老子（老聃）和庄子（庄周）。他们的处世态度是消极的，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中地位日益下降的中下层势力。他们“忧世”，对世事悲观失望，他们厌世、避世、逸世，主张“无为而治”。然而，从他们对统治者惨无人道迫害百姓的无情揭露中，仍能看出其内心之愤慨，忧世之激情。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sup>②</sup> 猛烈地鞭笞了当时的统治者。庄子也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滥杀百姓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了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忧世之情。但他主张进入一种“无思无虑”、“无生无死”的神秘的精神世界中去求解脱，这就是消极的了。

墨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为墨子（墨翟）。他们代表了一个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社会阶层，墨家学说显露出强烈的平民色彩，充满着小生产者的原始平等观念。他们揭露了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主张‘兴天下之利 除去天下之害’<sup>③</sup> 忧民思想比较突出。认为贵族的侈奢 造成国家贫穷“民财不足 冻饿死者 不可胜数”统治者的征战“又使病死者、战死者不可胜数”<sup>④</sup>，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愿

① 《孟子·梁惠王下》。

见《老子》第 75 章、74 章。

③ 《墨子·兼爱》。

④ 《墨子·节用上》。

望，表达了下层人民的主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们还认为王公贵族的忧患与民之忧患是对立的，但又主张加以调和。

法家学派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其主要代表是韩非和商鞅。他们主张加强君权，实行法制。所以，毫不掩饰地把“忧天下”与“忧君主”直接等同起来。他们明确提出“不必法古”，“反古者不可非”，认为一切措施都要有利于新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世异而事异”，“事异而备变”<sup>①</sup>。如果时代变了，人们却墨守成规，则势必为人耻笑。在他们“忧天下”的内容中，“忧民”因素虽不多，但忧国、忧世、重视改革、锐意创新的积极因素是不少的。

上述各家的忧患意识虽各有其特点，但“忧国”、“忧民”、“忧世”、“忧天下”是共同的，而且忧患意识的内涵也是极其丰蕴的。是观察与思考的升华，是理智与情感的融通，是理想与现实的砥砺。构成了先秦时期的一种时代精神，为以后忧患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秦汉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从司马迁到柳宗元，从黄宗羲到孙中山，忧患意识犹如山岭之绵亘不绝。到明末清初之际，由于社会的极大动乱，新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出现，反映早期市民阶层利益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子等人脱颖而出。他们面对社会的沉沦、朝政的黑暗，尤其是清军入关后和汉族地主统治阶级相勾结，对人民，特别是对参加抗清斗争的人民的残暴迫害和杀戮，更激起了忧国、忧民之情，愤然起而抗争。他们几乎都参加过抗清的武装斗争，通过总结实践斗争的教训，反思“天崩地解”的缘因，从而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振聋发聩的呼喊。

鸦片战争时期，面对外敌的入侵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一批开明思想家，把忧国、忧民、忧天下之情提

<sup>①</sup> 《韩非子·五蠹》。

高到新的高度 魏源提出了“以夷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对付外敌入侵和学习外国之长结合起来，开始了中国人从封建文化之外去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新阶段，这对忧患意识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超越。随后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继承了上述忧患意识的合理内核，并加以充实发展，使它更接近于时代 接近于现实 接近于人民。

20 世纪初 广大的爱国志士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社会沉沦 忧患意识更是喷涌而出。忧国忧民与救国救民的行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西方列强诸国已完成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之间在全世界范围的称雄争霸愈演愈烈。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却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开始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封建统治者（包括民国初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除了贪婪、腐败、向人民横征暴敛外 还出卖主权 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以取得“太上皇（外国主子）的庇护而苟延残喘。这就使得堂堂中华处于分裂破碎的飘摇之境，巍巍神州被推上了生死存亡的悬崖峭壁。当时的中国，正如毛泽东所描绘的：是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sup>①</sup>。社会的改造、国家的进步、民族的生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成了一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先进分子的思想主流。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辛亥革命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随之有了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630 页。

于战争，顾不上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实力，有了一定的增长。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孪生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成长与壮大，工人斗争的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五四”运动中，他们带着明显的阶级主体意识，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动，必将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思想意识的萌动产生深刻影响。

此时，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也开始崛起。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一批大学先后创办，一批报刊杂志陆续出版发行，从而出现了一批教师、作家、新闻工作者、记者等以知识为职业的新型知识分子。特别是 1905 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提倡“废科举，办新学”，这就在制度上堵塞了“由士而仕”的读书作官之途，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以功名利禄为唯一标准的择业意向。他们开始以自己的知识谋求职业，为社会服务，从而获得了以创造文化为职业标记的独立社会身份，赢得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士大夫便历史性地转化为近代的新型知识分子。

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目睹统治者的腐败、社会沉沦、人民疾苦，因此忧国、忧民之心搏动更烈，忧世、忧天下之情愤之更甚。他们义愤满腔，壮怀激烈，将忧患意识发展、升华到前人所不曾有过的新的高度。

首先，他们将忧患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动人们从悲天悯人的状态走到现实政治斗争的激烈的环境中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会在学术与政治这两条道上进行艰难的自我选择。有些人崇尚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竭力将自己禁锢在学术研究的小天地里，视政治为肮脏的渊薮，尽量使自己超乎在一切政见之上。然而，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掀起的阵阵狂澜，使之无从回避现实。国颓民危，痛苦地折磨着一切怀有爱国爱

民之心的人们。所以，把这种忧国忧民之情引入到实际的政治斗争，把研究新思潮和现实政治斗争完全结合起来，就成为忧患意识在 20 世纪初的一个显著特点。

胡乔木在纪念李大钊诞生 10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就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匹夫有责”正是政治参与意识的充分表达。李大钊从“党私”、“省私”、“匪氛”；以上三端，百思恐不获免。……曷有以解我忧”<sup>①</sup>发展到以极其愤怒而沉痛的心情，投入当时沸腾的政治斗争。在日本留学时，他就积极投入反日反袁世凯的斗争，回国后不久来到《新青年》编辑部，投入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并以其锐利之笔，猛烈地抨击当时反动军阀的统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人民的觉悟，鼓舞群众的斗志，还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饱满的政治热情，率先讴歌了十月革命开辟的历史新纪元，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以天下为己任，把忧患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结合起来的杰出典范。

为学术而学术原本属于太平盛世的蓬莱仙境，而在大厦将倾之际，生灵涂炭之时，就更属幻想。有些人明知“超然治学”是一种对现实的逃脱，将为国人所不耻，但又不愿尝试可怕的政治风险，于是吹奏起“学术救国”的论调，表明自己既未脱离现实，又不介入政治，将自己安插在脱离政治火线的“安全地带”。于是，“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论调相继出笼。当然也有不少受上述观点影响的人，是真诚地相信它的功效的。但，不论是真诚拥护也好，还是借此获得短暂的心理平衡也好，在残酷的现实和强烈的政治风暴冲击下，只要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最后，势必打破这短暂的心理平衡。而一些真诚地相

转引自《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 4 页。

信它的功效的人，也必定会在轰轰烈烈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撞击中醒悟。像陈独秀，他在 1905 年《新青年》创刊时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抱超然态度，他在回答读者时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sup>①</sup>。然而到了 1918 年，他和李大钊合编的《每周评论》就是一份政治性很强的专评时政的刊物。五四运动前后，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短文，篇篇都是投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匕首”。最后，拍案而起，呼吁“我们青年要立志走出了研究室就投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sup>②</sup>。又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青年时期都曾在“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上滞留过，最后在实际斗争的教育下，走上了参与政治的道路。李达，1917 年东渡日本，专心攻读理科，但残酷的现实，促使他投入了爱国的政治斗争。1918 年，在日本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协定的斗争。5 月，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这次请愿虽没达到预期目的，但对他思想触动很大。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幻想”<sup>③</sup>。6 月重返日本后，放弃了理科的学习，专心攻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爱国的、革命的先驱者邹韬奋，原先也主张“力求政治清明”与“振兴实业”，并认为这是救国的“根本要策”。然而眼见统治者的日益腐败，并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终于提出必须“把政权与武力放在民众手中，放在确能为民众奋斗的集团手中，绝对没有其它的便宜的道路走”<sup>④</sup>。

正是这种结合，使得忧患意识注入了亢奋的政治激情，驱使一

① 《新青年》第 1 卷第 1 号。

转引自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 年 13、14 期合刊。

转引自胡绳：《纪念爱国的、革命的先驱者》，《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切爱国的志士仁人，愤然而起，积极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孜孜不倦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其次，他们将忧患意识与锐意进取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人们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迈进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征途。

忧患意识本身就含有否定与进取的精神。但是，20 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大地上的新旧思潮之争、中西文化之争，以及打着各种旗号的新思潮、新主义纷至沓来的复杂的异说争鸣局面，就必须进一步发扬和发展这种精神，不断地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气概，去迎接这种种思潮的碰撞和冲击。敢于“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李大钊语)；要有彻底的觉醒、猛勇的决心 否则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陈独秀语)只有这样 才能在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抱负中增添新的内涵、新的因素，使忧患意识具有更充沛的活力。

20 世纪初的中国，长期统治中国的政治轴心已呈崩塌之状，原有的统治者失去了控制思想界、舆论界的权威和力量，旧有政治统治的失衡及其势力的衰颓，使大批爱国志士，主要是知识分子，得以摆脱旧的政治羁绊，在思想上获得自由。但同时，各种流派、各种思潮也因旧政治轴心的失控而蜂拥前来，使得思想文化界显得那么无序和混乱，这就必须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才能“摧廓而澄清之”，所以，锐意进取精神也是时代为他们所创造的机遇和条件。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倡导思想自由，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 以饱含感情的犀利之笔 抨击‘往圣前贤’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 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 向几千年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的挑战。他们呼吁人们要敢于蔑视它的权威，以便确立自己真实合理的信仰，从而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虽然，他们的认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但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启迪了民智 震动了整个思想文化界。提倡

解放思想并不是鼓励人们让思想去做无边际的遨游。所以，他们揭糞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宣传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鼓吹西方的民主主义，试图在中国建设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他们开始了“努力学习西方”的追求。陈独秀说：自己原来是学八股、讲旧学的，接触到西方的政教学术之后，感到“粲然可观，茅塞顿开”<sup>①</sup>。因此，人们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sup>②</sup>。

1920年10月20日，法国《小马赛人报》报道：100名中国青年乘“鸯特莱蓬号”邮船，经历39天时间来到马赛。这100人中有位年龄最轻的青年，就是邓小平。在国外，他们历尽人间艰辛，“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但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真理，面对重重艰难和压力，依然一往无前。

但是，西方列强决不会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在中国贪得无厌的掠夺和榨取，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困惑，一方面钦佩“西方文明”，一方面又痛恨列强侵略，对同一事物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另外，在实践中，“学习西方”总是行不通，在中国搞起来的多党制，如国民党、立宪党、进步党，结果却变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搞起来的议会，结果除被一群政客吵吵嚷嚷外，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后来，还闹出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从西方搬来的一些理论，如天赋人权论、进化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也不断失灵。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结果却“种瓜得豆”！<sup>3</sup>这是孜孜追求者所始料不及的。他们惊呼：“无数头颅无数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教训发人深省！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更加尖锐

<sup>①</sup>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37页。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

的形式暴露了出来。西方的文明被弹烟血雨所淹没，“文明”的世界在进行着一场“强盗”战争。整个欧洲充斥着战乱的腐败。就连许多西方国家的思想家也产生了沉重的失落感，于是这种西方“文明”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心目中顿失光彩。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以及和会上西方国家首脑们拿中国利益作肮脏的政治交易，更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崇尚西方文明中省悟。

“学习西方”遭到幻灭以后，有的人一度消沉，认为生于乱世，国是日非，治国的理想变得如此遥远，于是投入学海，潜心书斋，失去了继续奋进的动力；也有的人无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无视帝国主义政客们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侮辱和欺凌，继续鼓吹“全盘西化”。在这条走不通的道路上苦苦徘徊，但大多数人，他们的忧患之情含有强烈的进取之心，因而怀着忧国、忧民之情，不屈不挠地继续寻找救国救民之新路。正在这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产生了莫大的希望，随即，开始把目光移向俄国，在中国出现了学习社会主义的热潮。

当时，社会改造呼声迭起，进步社团与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于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思潮，鱼龙混杂，纷至沓来。除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外，还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等。除此之外，还有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柏格森的生命派哲学等，也打着新思潮这面大旗混杂其中。“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的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sup>①</sup>。这给中国的先进分子再度造成困惑，刚刚从“学习西方”的历史迷宫

<sup>①</sup> 《瞿秋白诗文选》第53页。

中跳出，又陷入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迷雾之中。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也曾形象地回忆当时他的“思想是个大杂烩”<sup>①</sup>。

为了拨开迷雾，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忧患之情为先导，以进取之心为动力，作了艰辛的探索。他们首先采取了努力学习的态度，只有通过学习才可以明是非、善鉴别、破旧立新、锐意进取。如蔡和森致函毛泽东说：他在法国的座右铭只有四个字：“猛看猛译”。在北京，聚集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青年，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大家都像入世未久的热血青年，并不瞻前顾后，就一头扎进当时最有魅力的新思潮中，如饥似渴地认真研读。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对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首先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接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还有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等等。通过争辩，廓清迷雾，在锐意进取的道路上又跨前一步。特别要提及的是，当时不少热血青年对某些政治主张、政治设想还进行了认真的试验。如北京的“工读互助团”虽然4个月的实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获得的教训却发人深省。除了“工读互助团”的试验，还有一些人在实践中作过类似的努力，结果都以失败为结局，这一切表明，中国的社会必须彻底改造。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不断总结，锐意进取，积极探索，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途。

再次，他们把忧患意识与面向工农、面向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忧患意识扎根于人民群众，成为“改天换地”的强大动力。

古代忧患意识的民主精神就是“忧民之忧”，把“忧国”、“忧天下”与“忧民”相结合。这种民主精神发展到20世纪初，必然走上面向工农、面向实际的道路。这样的忧患意识，不只在知识分子队伍中流传，在知识分子的血液中涌动，而是走出书斋，面向群众，深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入到广大人民的意识之中。在中国，人民群众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把忧患意识渗入到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中去，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变为改变世界的巨大社会动力。而且这种“与民同忧”、“与众同忧”、“与工农同忧”的意识，也必然促使广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过程中使他们自身也得到锤炼。

“为民”、“爱民”、“为百姓”、“爱百姓”这些口号在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口中都出现过，但真正深入到最基层、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中去是到了本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以及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才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中的主体是工人和农民。这就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眼光去审视这个问题，从而形成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洪流，只有这样，为民、为群众才从口号变为现实。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代表了新的生产力。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必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救中国于危亡，兴中国之大业，离不开这个阶级。挽救危亡、振兴中华的领导责任只有落在他们身上，中国才有希望。一切有识之士，一切具有忧患意识的爱国知识分子必须认识这个真理，实践这个真理，努力面向工农、面向实际，把忧患意识化为忧工人所忧，急工人所急，兴工人运动，做工人工作。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已经指明这点，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sup>①</sup>。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以其顽强的斗争精神，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伟大力量，给了一批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教育。

<sup>①</sup>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 71 页。

当时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和认识到面向工农、深入工农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1929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各报刊杂志纷纷撰文纪念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各地还开展了广泛的纪念活动，上海工人在统治者派出大量武装军警的阻挠下，几易场地，召开了纪念大会。会上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陈独秀被推为筹备大会顾问。随后，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办起“劳动补习学校”、“劳工半读学校”、“工人识字班”等，在工人中进行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他们认识到，当今世界之潮流是劳工主义的潮流，必须“与劳工为伍”。所以，主动深入工人，为工人讲话，替工人办事，与工人交朋友。各地知识分子（主要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还先后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工人周刊》、《劳动与妇女》等通俗刊物，用浅近的语言，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介绍各国和各地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状况，还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把中国糟蹋得国颓民危的血淋淋的事实，唤起工人的觉悟和救国之心。他们深入工人群众，培养工人骨干，组织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并通过这些活动把大批工人团结起来。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与此同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面向工人、深入工人、与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中，思想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不仅认识到现代产业工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必须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努力奋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锻炼了他们学会以工人阶级的眼光和胸怀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懂得了必须把民族义务与阶级义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解放与劳苦大众的解放、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统一起来，努力地拯救中国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而积极奋战。最后，把自己也锻炼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

面向工农，还必须倾注最大的精力去面向农民。占了中国人

口 80 % 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中国的振兴和发展，离开他们将一事无成。长期住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一提起农民，就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农民不是不愿读书，而是没有条件读书）就觉得他们很脏（农民不是不愿穿华丽而美观的衣裳，同样是没有这种条件）所以，当农民运动起来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什么“出轨”、“添乱”、“痞子运动”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就会有一定的市场。因此，要使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民群众之中，和农民斗争结合起来，就需要在思想感情上来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移到农村，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愿不愿到农民中去与他们同呼吸、共战斗，成为摆在革命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问题，他向一切愿意革命的知识分子呼吁，并以自身的实例，深刻地指出：“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穿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sup>①</sup>。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许多青年和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打起背包、深入农村，和农民交朋友，向农民学习，并对农民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有一位从抗战后方去延安的知识分子，回来后说：在延安最大的收获，就是到农村去住了两年，原来自己把农民当朋友，现在觉得他们是自己真正的知己；原以为自己的文化高，知书达理，现在看来，农民的觉悟高于自己，他们是可尊敬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851—852 页。

的，人格也是高尚的。

事实也是这样，中国的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有着强烈改变现状的要求。虽然受到生产方式的限制，思想比较闭塞，但在长期艰苦的劳动中培养出朴实无华、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作风是十分可贵的。只要对他们施以革命的政治教育和严格的组织训练，就可以激发出巨大的革命潜力，组织成有高度觉悟和严格纪律的队伍，就能经受住敌人的围攻和迫害。在战争岁月里，多少个“革命大娘”和“红嫂”为了挽救自己的同志，义无反顾、舍生忘死，谱写了一曲曲真情动人的乐章；多少农民子弟，面对强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董存瑞、张思德式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的深入教育和严格训练下，无数农民被改造成成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成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和坚定的党的干部。

深入工农、面向工农的过程中，必然养成尊重工农、尊重实际的优良作风。理论一旦和实际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基础，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革命。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忧患意识在中国的发展，其主要代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是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优秀的党员。他们把忧患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锐意进取精神以及面向工农、面向实际结合起来，使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了更进一步的升华，成为炎黄子孙一往无前、奋力搏击的强大精神原动力。